

移民与留守篇

Immigrants and Left-behind People

B.7

温州丽岙华侨华人移民西欧调查研究^{*}

徐辉 吴征涛^{**}

摘要： 文章从微观的视角介绍了目前侨居西欧的温州丽岙华侨华人的出国历史与原因、职业发展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丽岙海外移民始于20世纪20年代，自然灾害、国内政治、家族环境以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等是影响和触发他们产生出国念头的主要原因。在移民初期，他们由于非法居留身份问题，从事一些低端工作，到后来成为合法劳工，并自主创业。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做苦力，到当雇工、小商贩、摆地摊，到各种规模创业的过程。

^{*} 本文为2020年度温州大学特色研究培课题（项目编号：WDQP20-ZZ002）“丽岙旅欧华侨华人口述历史”的阶段性成果。

^{**} 徐辉，博士，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温州大学侨务公共外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海外移民研究、侨乡研究、日语教育；吴征涛，博士，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交涉学。



关键词： 丽岙 华侨华人 移民 西欧

丽岙是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的一个小型街道，总面积 34.7 平方公里。丽岙华侨所占人口比例高，他们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全街道现有人口 4.2 万人，海外华侨 2.2 万人，占全街道现有人口的 52.4%。有归侨、侨眷 1.6 万人，占全街道现有人口的 38.1%，海外华侨加上街道内归侨、侨眷占全街道总人口的 90% 左右，^① 丽岙全街道几乎都姓“侨”。为了更好地了解丽岙华侨的出国相关情况，笔者对欧洲丽岙华侨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本文是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 研究目的及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丽岙华侨移民历史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当初选择出国的原因和动机；出国之后，在国外主要从事的职业。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定居欧洲的丽岙籍华侨华人，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访谈。访谈主要是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完成。滚雪球抽样是指先随机选择一些被访者并对其实施访问，再由他们提供另外属于同一类型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根据所形成的线索选择此后的调查对象。调查人员根据后续调查对象，进行此后的调查。滚雪球抽样往往用于对稀少群体的调查。笔者选择的调研单位是丽岙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并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之后，委托丽岙街道侨联主席、侨联秘书长，丽岙街道统战部，以及温州市瓯海区商务局、温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引荐并介绍海外丽岙华侨，以便采访。在采访过程中，笔者又委托受访者介绍符合条件的其他海外华侨。最终，联系到了在欧洲定居和生活的 41 位温州籍华侨，其中有效案例为 20 位。笔者对以上 20 位华侨进行了深度采访，听取了他们的个人移民及

① 以上信息来自 2020 年 4 月 3 日笔者对丽岙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孙芸荪先生的采访。



发展历史。考虑到研究伦理问题，本文对所有受访者采用匿名的方式。20位华侨的个人信息如表1所示。

本次的访谈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完成。一是通过微信（线上）采访。这部分采访对象目前都侨居欧洲，不在国内。采访前几日，笔者把采访提纲通过微信发给受访者，之后约定采访具体时间。考虑到欧洲和中国的时差问题，笔者把采访时间放到了受访者比较方便的当地时间上午10时（北京时间下午4时）以后。采访前，笔者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对访谈进行了录音。20位华侨中有14位是通过这个方式完成的。二是面对面采访。20位华侨中有5位是通过面对面采访的形式完成的。以上5位均是在2020年疫情暴发前回国，由于疫情，他们暂时在国内生活。三是受访者通过笔答的形式完成。即笔者先给受访者提供采访提纲，受访者拿到提纲后通过笔答的形式完成。20位华侨中有1位是通过这种形式完成的。采访完毕后，笔者第一时间整理采访录音。在整理采访录音的过程中，笔者用红色标注了采访中存在的疑惑和不明了的问题，之后以文字的形式发给受访者查阅并让受访者对采访录音稿的疑问和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回答。针对笔答问卷，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表1 受访者的个人信息

序号	姓名	出生年份	出生地	学历	出国年份	职业	定居国家	采访时间
1	WYD	1961	路溪村	初中	1990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13
2	HQC	1962	路溪村	初中	1991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19
3	CJY	1963	路溪村	小学	1987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20
4	CLJ	1967	丽岙街道	中专	1989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20
5	DGY	1957	华侨新街	小学	1983	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法国	2020.05.08
6	DZG	1981	下川村	工商管理硕士	2002	贸易公司经理	意大利	2020.05.09
7	JJY	1963	丽岙街道	初中	1991	中华料理店经理	法国	2020.05.10
8	MYO	1969	丽岙街道	中专	1996	小百货店经理	意大利	2020.04.06
9	WSM	1964	丽岙街道	初中	1990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23



续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份	出生地	学历	出国年份	职业	定居国家	采访时间
10	YZH	1968	丽岙街道	初中	1979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25
11	ZCB	1972	丽岙街道	高中	1993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25
12	ZCW	1964	后盾村	初中	1988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4.24
13	YCD	1965	丽岙街道	小学	1990	小百货店经理	丹麦	2020.05.13
14	YLZ	1963	丽塘村	初中	1990	贸易公司经理	西班牙	2020.05.16
15	WYW	1975	茶堂村	小学	1986	贸易公司经理	西班牙	2020.05.12
16	YYZ	1970	丽岙街道	大专	2009	佛教寺院住持	意大利	2020.05.21
17	ZAA	1965	下章村	小学	1987	小百货店经理	法国	2020.05.18
18	XAY	1963	杨宅村	小学	1985	小百货店经理	意大利	2020.05.09
19	HXS	1965	叶宅村	初中	1978	贸易公司经理	法国	2020.05.20
20	VUZ	1968	河头村	小学	1989	中华料理店经理	法国	2020.04.17

注：以上资料根据笔者 2020 年 4~6 月的调研制作而成。

如表 1 所示，20 位华侨祖籍来自丽岙街道或其下属行政村。最大年龄 63 岁（1957 年出生，年龄以访谈时间计算，下同），最小年龄 39 岁（1981 年出生）。出国前的受教育程度，小学学历 7 位，初中学历 8 位，中专学历 2 位，高中、大专和工商管理硕士学历各 1 位。出国时间最早的是 1978 年，最晚的是 2009 年。从所从事的职业情况来看，贸易公司经理 12 位，小百货店经理 4 位，中华料理店经理 2 位，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和佛教寺院住持各 1 位。从定居国家来看，最多的是法国，13 位；其次是意大利，4 位；第三位是西班牙，2 位；最后 1 位定居丹麦。

二 丽岙华侨出国简史及原因

（一）移民简史

丽岙华侨移民海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相关文献^①和笔者调研，大体

^①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



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 年以前），称之为“萌芽期”。20 世纪 20 年代，丽侨华侨主要以劳工和经商的方式来到法国，之后慢慢融入法国。^① 早在 1929 年，丽侨街道下呈村汪迪斌等 9 位（其中 7 位去法国，2 位去荷兰）先辈就离开家乡前往欧洲谋生。1934 ~ 1936 年 3 年间，共有 238 人出国。截至 1936 年底，丽侨街道共有 425 人前往欧洲，其中 92.7% 的人前往法国，去其他国家的人占 7.3%。^②

第二阶段（1937 ~ 1946 年），称之为“回国返乡期”。1937 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国人数骤减，丽侨华侨大批回国，当年丽侨街道仅有 11 人出国。当时丽侨华侨大批回国，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具有爱国心的华侨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与外国邮路不畅，欧洲华侨无法给家里汇款，部分华侨带钱回国。^③ WYD 说：“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海外华侨心系祖国，有的华侨甚至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把钱捐献给国家；有的把正在读高中的孩子送回国学习驾驶战斗机。”^④ 1937 ~ 1938 年欧洲各国忙于备战，社会动荡，生意萧条，华侨处境困难。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丽侨华侨 4 人死于国外，44 人离开欧洲回国。1942 年，下章村的华侨 9 人从法国马赛回国。1946 ~ 1949 年，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交通受阻，出国人员不多。^⑤

第三阶段（1949 ~ 1978 年），称之为“停滞期”。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出国审批相对严格，这一时期丽侨街道出国人数没有明显增加。根据章志诚和周福绵的文章，1957 ~ 1960 年丽侨街道仅 8 人出国；从 1961 年起，出国人数开始增加，当年 9 人去法国；1962 ~ 1965 年，丽侨街道有 30 人去法国，14 人去荷兰；1950 ~ 1965 年，无前注意大利者。1966 ~ 1976 年，丽

① Live Yu-Si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France Immigration, Economic Activity, Cultural Organizational and Representations,” *Chinese in Western Europe*, Free Press, 1991, pp. 96 - 125.

② 引自笔者对丽侨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孙芸荪的采访。

③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5 页。

④ 引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笔者对 WYD 的采访。

⑤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5 页。



岙街道有 128 人出国，其中前往法国的有 82 人，前往荷兰的有 46 人。^①

第四阶段（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称之为“高潮期”。改革开放以后，出国审批逐渐正常化，丽岙街道出国人数有所增加。温州籍华侨开始前往法国，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往法国的温州籍华侨增多。本次采访的 20 人均是这个时期前往法国的。截至 1997 年底，丽岙街道出国人数达到了 9402 人，截至 2005 年底达到了 24148 人（其中欧洲 24006 人，大洋洲 1 人，北美洲 87 人，南美洲 21 人，亚洲其他国家 33 人）。^② 根据丽岙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9 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丽岙街道 23 个行政村共有海外华侨 32706 人，其中前五位的国家是法国（17814 人，占 54.5%）、意大利（13213 人，占 40.4%）、荷兰（586 人，占 1.8%）、西班牙（464 人，占 1.4%）、葡萄牙（217 人，占 0.7%），其他国家和地区（412 人，占 1.3%）。^③

（二）移民原因

根据笔者的调研，丽岙华侨出国主要是受自然灾害、国内政治形势、身边及周边华侨获利、欧洲经济发展需求和国内计划生育政策等影响。

第一，受自然灾害的影响。1853 年，丽岙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水灾。^④ 1929 年又逢特大自然灾害，虫灾蔓延，稻禾枯死，收成大减。当时丽岙的虫灾十分严重，一亩地仅收十几斤谷子。由于丽岙地方农民口粮不足，生活穷困，许多缺粮户或以地瓜丝掺和米做饭，或以南瓜杂米做饭，过着半饥饱的生活。一直以来，一些生活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为生计所迫，而离乡背井，出国谋生。^⑤

第二，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丽岙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

①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5 页。

②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6 页。

③ 以上数据来源于丽岙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室内部资料。

④ 引自笔者对丽岙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孙芸荪先生的采访（2020 年 6 月 20 日）。

⑤ 引自 2020 年 4 月 19 日笔者对 HQC 的采访。



农民协会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贫苦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同当地的封建地主做艰苦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镇下呈村贫农出身的杨炳春、郑兴芝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五减租”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当地的封建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对杨炳春等人进行政治迫害。杨炳春被捕入狱，郑兴梁被抓去坐“老虎凳”，郑兴芝被列入追捕对象。这几个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人，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以后，感到在当地待下去会有风险，为免遭再次政治迫害，便星夜筹措旅费，逃出丽岙，奔赴欧洲各国避难。^①

第三，受丽岙本地华侨获利的影响。丽岙首批旅欧华侨经商获利的消息传到家乡后，诱发了不少想发财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如1935~1936年，在林岩甫、张岩林等人在法国经商获利的影响下全镇掀起出国热潮。^②当时丽岙人出国谋生，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是旅费问题。当时，从上海到欧洲各国，每人要支付450银元到500银元。为了筹措旅费，有的卖田卖屋；有的向亲戚朋友求助。其次是办理护照困难。

第四，受周边其他地区华侨获利的影响。20世纪初，前往日本、欧洲国家经商的青田县华侨回国后，在丽岙的丽塘、泊岙和下章村等村购买田地、房屋安家落户。如1912年前往日本的陈仁德，1928年转赴法国做生意，赚了一笔钱，1932年回国，在泊岙村买了40亩田地、3间房子，全家迁入泊岙村定居。以上事例对丽岙人出国谋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③

第五，受欧洲经济发展需求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和中期，欧洲各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手不足，需要一大批劳动力，当时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出国相对比较容易。^④WSM说：我爷爷的堂弟，也就是我的叔爷爷在法国，他是一九三几年出国的。当时我爷爷的几个

① 引自笔者对丽岙街道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孙芸荪先生的采访（2020年6月20日）。

② 引自2020年4月19日笔者对HQC的采访。

③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224页。

④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224页。



兄弟都以做劳工的方式去了法国。受他们的影响，我也决定出去打拼一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从法国回来的华侨前辈们很吃香，我们都围着他们转。^①

第六，受国内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丽岙人的生育观念仍然以“多子多福”为主导思想。部分丽岙人为了多生几个孩子，逃避计划生育而出国。ZCB 说：“我出国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我们是农村人，一个孩子是不够的，想多生又不让生。现在可以生二孩。”^② 本次笔者采访的 20 位受访者中，育有 3 个至 4 个孩子的占 80% 以上。

通过文献和本次调研笔者发现，目前出国的手段或途径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年轻一代的丽岙人始终保持着老一辈华侨所持有的传统习惯，如通过中介、借款或筹款等方式出国。因为受身边亲戚朋友的影响，出国就能赚钱的念头在丽岙人头脑中始终存在。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三 欧洲丽岙华侨华人职业

丽岙华侨在海外凭着聪明才智和顽强的创业精神，在欧洲经历了从做苦力（打黑工）、当雇工、做小商贩、摆地摊、创办工厂（小百货店等），到最后创业当经理这一过程。在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之后，丽岙华侨实现了出国赚钱、养家糊口、建造或购买房子等愿望，也实现了职业的提升和转型。

打黑工是很多丽岙华侨来到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或者说是不得不从事的工作。之所以要打黑工，与其移民欧洲各国的背景息息相关。在笔者采访的 20 位丽岙华侨中，有 15 位华侨是通过非法途径（“黄牛捎”^③ 的形式），5

① 引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笔者对 WSM 的采访。

② 引自 2020 年 4 月 25 日笔者对 ZCB 的采访。

③ “黄牛捎”是温州人对通过非法途径出国的一种说法，等同于“蛇头”，指带路人或组织者，一般是指那些把偷渡的人带出境外、从中赚钱的人。



位是通过旅游签证前往欧洲国家，之后滞留。因为初到欧洲国家（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合法身份，语言不通，为了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工。王春光教授对海外“黑工”做了以下解释。他认为“黑工”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打工赚钱；第二层是那些有合法身份和打工许可证的人打工不报工，他们有经济收入不缴税，同时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第三层是虽然报工，但是做了修改，把在公司做工申报为个体户，以获取个体户享受的优惠税收政策待遇。^① DGY 说：“刚到巴黎，没有身份，只能先在亲戚家皮包工厂打杂工，每天工作时间很长，大部分都做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收工。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干活，工作时间太长，太累。出国之前觉得外国的钱好赚，出来之后才知道原来赚钱这么辛苦，再加上语言不通，说实在的，当时有点后悔出国。”^②

YCD 说：“到法国后，我吃和住都在亲戚家，也在他们的皮包工厂当帮工。因为当时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做黑工。但我不甘心，学了点法语 ABC 后，离开亲戚到温州人开在巴黎三区的中餐馆做餐厨。”^③ 在 20 位受访者中，19 人有给他人当雇工的经历。

WSM 说：“当时，我在越南人开的店里打工。经理给我的月工资是 9500 法郎，因为我的技术已经很熟练了，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如果有加班，每天另外再给 500 法郎。”^④

从事小商贩生意和摆地摊。从 1929 年至 1939 年，丽岙有 302 人前往欧洲各国，其中从事小商贩生意的人有 281 人，占 93.0%。^⑤ 邹韬奋在他的作品《萍踪寄语》中写道：“这种小商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当地的外国语，引者注），不识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规章，动辄被外国的警察

① 王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第 112 页。

② 引自 2020 年 5 月 8 日笔者对 DGY 的采访。

③ 引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笔者对 YCD 的采访。

④ 引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笔者对 WSM 的采访。

⑤ 温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温州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7 页。



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当然更说不到有谁出来保护！”^① 受访者 MYO 在介绍他的故事时说：“在意大利做小商贩生意不容易，起早贪黑不说，还要看当地人的眼色，常常受到他们的鄙视和欺凌。有时候还会遭受挨打，有苦难言，有理难诉。有的人因为没有居留护照，被当地警察局抓起来关押一个月、三个月，有的甚至六个月的也有。”^② 很多丽岙华侨在创业当经理之前几乎都做过摆地摊的生意。在欧洲，摆地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流动摆摊，另一种是固定摆摊。但在法国，无论是流动摆摊还是固定摆摊都需要营业许可证，还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费用根据摆摊的地理位置和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收费不同，最低每个摊位费是 3 欧元，比较高的地区是 20 欧元。而且每 3 个月必须向当地市场管理部门缴纳一次税金。^③ 根据《瑞安市华侨志》的记载，1939~1945 年，丽岙华侨华人干苦力、从事小商贩和摆地摊的人数占法国华侨华人总人数的 72.8%。^④ XAY 回忆说：“在意大利，不是每天都可以去摆地摊的，有时间上的限制，比如一个星期只有两到三次。生意也不是很好，有时一天也卖不掉几件东西，离住的地方又远，早上早早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说实话，赚不到几个钱。如果说赚，也是赚个辛苦费。”^⑤

开工厂、开商店（小百货店）、开饭店，当经理。在温州人的眼里，当经理是富裕的象征，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体现。经过多年在外打拼，丽岙华侨不满足于给他人打工、从事小商品买卖和摆地摊的生意，开始创业，如开服装和皮革工厂、皮革商店、餐饮店、跨国贸易公司等，涌现出一批又

① 邹韬奋：《萍踪寄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萍踪寄语》是民国时期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所写的一部游记作品。书中收录了他通过考察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特别是各国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所写的作品，包括《船上的民族意识》《月下中流——经苏彝士河》《世界公园的瑞士》《华美窗帷的后面》《大规模的贫民窟》《谒列宁墓》《由柏明汉到塞尔马》等作品。本文中引用的是他在 1933 年 7 月，因屡屡揭露政坛黑暗，乘坐意大利轮船“佛尔第”号离国出走欧洲后的所见所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② 引自 2020 年 4 月 6 日笔者对 MYO 的采访。

③ 以上内容引自笔者在 2020 年 4~6 月的采访。

④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9 页。

⑤ 引自 2020 年 5 月 9 日笔者对 XAY 的采访。



一批知名的企业家，如老一辈华侨郑振中先生、任岩松先生和杨岩生先生等。^① 本次笔者采访的 20 位中有 12 位就是通过省吃俭用、勤奋努力创办了跨国贸易公司并拥有自己的品牌产品，而且有些产品远销世界各国。根据《瑞安市华侨志》的记载，1966~1986 年，开设皮革商店和皮革工厂的法国华侨占总人数的 63.8%，以劳工为主的占 23.7%，仅有 0.41% 的人从事较高层次（比如银行、公司等）的职业。^② HQC 主要从事服装贸易（主要做女装，在法国和中国有自己的服装工厂），并创建了自己的品牌 see u soon，产品远销美国、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日本、迪拜、中国、西班牙、比利时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年轻女性的欢迎。HXS 初中毕业后就到了法国。从开零售店卖日常生活用品开始，到开连锁店，再到做内衣进出口贸易，最后到商业地产租赁等，经过 30 年左右的打拼，2010 年他经营的公司 在巴黎正式挂牌上市。JJY 在法国巴黎美丽城经营的中华料理店多次被国内的主流媒体（CCTV）报道，现今已经成为美丽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和海内外知名的饭店之一。DGY 经营的会计师事务所，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高度评价和信任，现已成为法国政府公认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除此之外，CJY、CLJ、YZH、ZCB 和 ZCW 等人的跨国贸易公司也实现了良好的业绩。

总结以上欧洲丽侨华侨的职业，可以发现，他们主要从事“三把刀”[餐馆（菜刀）、皮包和皮衣服（皮刀）和裁缝（剪刀）行业]、做小商贩生意和摆地摊等自由职业。VUZ 说：“我们丽侨人之所以从事‘三把刀’职业比较多的理由是，这些行业投资比较少、技术含量不高，适合家庭式经

① 1939~1945 年，丽侨华侨华人在法国办了 11 家皮革工厂。1936 年郑振中等人合伙在巴黎三区开办了“振瓠公司”，主要经营小百货批发业务。1938 年，任岩松等人在巴黎开设了小百货批发商店和皮革工厂。1939 年杨岩生等一行人在巴黎三区创办皮革工厂等。1945~1965 年，丽侨华侨华人在法国共建皮革工厂 27 家、餐馆 4 家、皮革商店 1 家和百货批发商店 1 家；在荷兰开办餐馆 14 家。以上数据参见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28~230 页。

② 瑞安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瑞安市华侨志》，中华书局，2011，第 230 页。



营，而我们温州人最擅长家庭式经营模式。”^① 王春光教授认为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上的一个重要取胜诀窍就是极大地降低经营成本。他们的做法主要表现在，第一，充分发挥家庭各个成员包括未成年孩子（虽然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家庭内部很难断定）的作用；第二，雇用没有正式居留身份的人；第三，采用不同的支付工资的方式，以降低雇用工人的税金；第四，做工时间比较灵活，工作时间比较长。因此，可以说欧洲丽岙华侨充分利用自身潜能和群体资源，以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做着自己的工作，从而实现自己的经理梦。

四 新生代华侨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

对海外温州籍华侨的教育问题，王春光教授 1999 年在他的论文中称：“温州人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的总体情况并不很理想。在法国巴黎温州籍华侨华人成年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生在中国但从小在法国长大的人比在法国出生的人的接受教育程度低。”^②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温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缺乏对教育的真正需求，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不足。^③ 众所周知，温州经济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与城乡集体经济密切结合的双层合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对劳动者的素质并没有很高的要求，教育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从而导致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严重不足现象。

而在法国出生的华侨华人新生代的受教育程度之所以比较高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国非常重视移民孩子的教育问题，凡是 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有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不去上学，居住地的学校会

① 引自 2020 年 4 月 17 日笔者对 VUZ 的采访。

② 王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第 116 页。

③ 鲍炳中、徐东民：《温州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派人到家里动员；另外有合法身份而不去上学的，孩子的父母就会受到法律制裁。^①除此之外，父母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对教育的重视、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生代华侨自身对学习的觉悟等方面也是促使华侨华人新生代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因素。

本次采访的 20 位华侨出国前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高中和高中以下学历^② 16 位，占 80.0%。这一点和 1999 年王春光教授得出的结论相同。但是在谈到华侨新生代的教育问题时，WYD 说：“我自己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缺陷，因此，我从小告诉我的三个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有了知识，你们才会强大……三个孩子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会说三个国家以上的语言。”^③

从采访中得知，丽岙华侨出国后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给自己带来了许多不便或麻烦。很多华侨逐渐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要学知识就必须接受教育。老一辈华侨出于工作等原因无法实现自己学习或接受教育的愿望，从而把自己的愿望或者理想转嫁到孩子们的身上，希望通过孩子们来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

DGY 说：“因为我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去了法国之后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为了不让孩子们走我当时的老路，也为了孩子们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幸福的未来，我当时决定一定要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的机会。除了学习他们自己喜欢的专业之外，我还要要求他们必须学习中文。因为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忙着打工、做生意，也没有太注意到他们在中文方面的学习。直到他们大学毕业后我才意识到他们的中文水平不是很好。于是就决定在他们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回国学习一年中文。大女儿（硕士研究生）和二女儿（博士研究生）去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三女儿（硕士研究生）去浙江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儿子（硕士研究生）在高中期间去了上海，在法国人开的

① 以上内容来自笔者 2020 年 4~6 月对受访者的采访。

② 本文把中专学历定为高中以上学历。

③ 引自 2020 年 4 月 13 日笔者对 WYD 的采访。



学校学习了一年中文，之后回法国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①

WSM 说：“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继承了我的事业。二儿子 1995 年在法国出生，在法国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的是理科，专业是有关电子方面的，具体学什么我也不是很了解。三儿子正在读大学。只要他们想学，砸锅卖铁我们也会支持他们学习。”^②

CLJ 说：“大女儿已经硕士毕业了，专业是金融管理。目前作为一名审计师助理在法国一家知名审计师事务所工作。小女儿在上大学，专业是法律。”^③

另外，本次采访中，在谈到丽岙华侨教育问题时，JJY 说：“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大家都想着如何填饱肚子。你想想，肚子都填不饱，哪里有心思去学习？很多人说我们温州人不重视教育，没有能力帮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或者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温州人。你想想，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出人头地呢……要接受教育就必须有接受教育的条件，没有条件，何谈教育？你说对不对？现在我们有条件了，不仅要鼓励孩子要上大学，而且还要上研究生，甚至攻读博士学位（我二儿子就在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条件。”^④

目前国家也十分重视海外华文教育。时任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2013 年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人社会的“留根工程”和“希望工程”，各方面都有义务共同支持这项事业，促使它更好、更快地发展。^⑤ 海

① 引自 2020 年 5 月 8 日笔者对 DGY 的采访。

② 引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笔者对 WSM 的采访。

③ 引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笔者对 CLJ 的采访。

④ 引自 2020 年 5 月 10 日笔者对 JJY 的采访。

⑤ 《裘援平：华文教育关系海外华人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gzdt/2013-08/04/content_2461040.htm。



外相关教育机构也同样重视“华二代”“华三代”的教育问题。西班牙华商协会创会会长、西班牙华商中文学校董事长李汝龙在“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国庆嘉宾座谈会”上说,“其实,每个海外华侨华人都非常关心华文教育,每个在海外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会说中国话,了解中华文化。华侨华人家庭如果没有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遗产给孩子们,就太遗憾了”^①。老一辈海外丽侨华侨受教育程度的确比较低,不是他们不愿意学习,而是受到当时一些客观条件和经济条件所限。他们经过海外打拼,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DGY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学好中文,让他们专程回国前往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学习。CLJ 和 JJY 的孩子在本科毕业的基础上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

除了以上三位之外,VUZ、YCD 等也纷纷表示一定要让孩子们在会说中国话、了解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很多华侨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使他们的下一代接受好的教育,给他们创造优越的学习环境。也有部分新生代华侨因为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进入了法国主流社会,进入法国政府机构或企业工作。

五 结语

本文通过采访,从微观的视角了解了丽侨华侨华人出国的历史、原因、职业状况。出于多种原因,丽侨华侨华人通过各种途径,想方设法移民欧洲,从打黑工到创业当经理,终于在欧洲各国立住脚跟,并为自己的后代创造了学习新知、创业发展的机会,改变了自己和新一代的命运。

此外,笔者发现一些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话题。比如调查对象数量有限,相关结论不能完全代表所有在欧洲的丽侨华侨。在接下来

^① 《海外侨胞吁每一位华侨华人为华文教育出一份力》,中国华文教育网, http://www.hwjyw.com/hjzx/hjxw/200710/t20071010_8270.shtml。



的调研中，需要增加研究对象数量，从宏观方面对欧洲丽岙华侨做进一步的研究。另外，研究群体也需要扩充。本次的调研主要以公司、小百货店、中华料理店经理等为研究对象，接下来对其他群体，比如海外华侨打工者、海外华侨女性和在法国出生的新生代华侨等群体进行调研是有必要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www.cnki.net